

历史哲学的发生现象学视角

——兰德格雷贝与胡塞尔和狄尔泰的思想关联

倪梁康

内容提要 作为胡塞尔的弟子和手稿的主要整理者,兰德格雷贝在发生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被凸显为胡塞尔后期最核心工作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通过将狄尔泰的历史世界的分析纳入到超越论现象学的语境以及与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的关联中,他不仅深入阐发了现象学对精神科学所可能具有的奠基意义,而且在沟通超越论现象学与基础存在论的问题上做出了重要的探索。

关键词 兰德格雷贝 胡塞尔 狄尔泰 发生现象学 历史现象学 超越论现象学

倪梁康,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教授 510275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 100048

上、兰德格雷贝与胡塞尔的师承关系

1928年应当可以看作现象学运动的“历史哲学年”,因为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1928年第九辑上不仅发表了弗里茨·考夫曼的历史哲学论著、他的任教资格论文:《瓦尔腾堡的约克伯爵的哲学》,而且还发表了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Ludwig Landgrebe, 1902–1991)的历史哲学论著、他的博士论文:《威廉·狄尔泰的精神科学》。除此之外,作为发生现象学、历史现象学的时间奠基之作,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也刊登在同一辑上^[1]。笔者在题为《历史哲学的现象学—解释学向度》(即将出版)的文章中已经论述了考夫曼与胡塞尔的思想关系。这里要讨论的是1928年现象学历史哲学二重唱的另一位歌手、奥地利人兰德格雷贝以及他与胡塞尔的思想联系。

在发表其论述狄尔泰精神科学的博士论文时,兰德格雷贝刚满26岁。他于1902年出生在维也纳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塞尔文集》中译”(12&ZD124)阶段性成果。

[1]参见 Fritz Kaufmann, *Philosophie des Grafen Paul Yorck von Wartenburg*; Ludwig Landgrebe, *Wilhelm Diltheys Theorie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Edmund Husserl, *Vorlesungen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ielbewußtseins*, in Husserl (Hrsg.),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IX. Band, Halle a. S.: Max Niemeyer Verlag, 1928.

的一个商人家庭里。因母亲早逝,他是由祖母抚养大的。他先在维也纳学习历史、哲学和地理,很早便受到那里的布伦塔诺思想传统的熏陶。而后因为对马克斯·舍勒的著述感兴趣而转向胡塞尔的现象学。1923年,兰德格雷贝转学来到弗莱堡,成为胡塞尔的学生,同时也成为当时还在弗莱堡担任私人讲师和胡塞尔助手的海德格尔的学生。

在弗莱堡大学学习的初期,兰德格雷贝对胡塞尔的感受并不太好:“胡塞尔大都是用长篇独白来回答问题,我常常在其中哀伤地失去头绪。而我又不敢打断他。”显然当时的助教海德格尔对于兰德格雷贝具有更多的吸引力:“他用铿锵有力的语言、表现主义的措辞来阐述他的命题:‘现象学就是此在实际性的解释学’。”^[1]兰德格雷贝的这个回忆对于我们要阐述的问题还会在后面获得更为清楚的意义。

但看起来胡塞尔对这位来自奥地利的同乡颇有好感,而且看起来兰德格雷贝当时的运气也很不错。因为这年夏天胡塞尔接到了柏林大学的聘书,邀请他去接任同年初在柏林去世的,在宗教、文化、历史、社会方面均有涉足的著名哲学家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 1865-1923)的讲席。此时胡塞尔已经六十四岁。他本来就没有去柏林任职的打算,但仍想利用这个机会与弗莱堡大学谈判:在确保原有的计划内助手的情况下,再增加一位私人助手。由于原先的计划内助手海德格尔于这年赴马堡担任那里的哲学副教授,他的位置由胡塞尔的另一位学生奥斯卡·贝克尔接替^[2]。最终增加的胡塞尔私人助手便是兰德格雷贝,他从这年开始直至1930年都担任此项工作,并因此有了支持他的大学学习与生活的经济来源。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兰德格雷贝主要都是在为胡塞尔整理他的手稿。他的工作与埃迪·施泰因在几年前作为胡塞尔私人助手所做的工作基本相同。首先是对1923/24年冬季学期的《第一哲学》讲座稿的誊写和整理,而后是对施泰因《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和《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的再整理和誊写。此外他还整理过胡塞尔的“发生逻辑学”的讲座稿,它们后来或多或少地呈现在胡塞尔的《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经验与判断》《被动综合分析》等身前和身后出版的著作和文稿中。

1927年,兰德格雷贝以《威廉·狄尔泰的精神科学》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考试,并于次年将论文发表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九辑上。在完成答辩后,兰德格雷贝希望能够在一所德国大学继续进行任教资格考试。但由于胡塞尔已于1928年退休,将弗莱堡大学的第一哲学教席移交给了海德格尔,而海德格尔对兰德格雷贝的评价并不高,因此兰德格雷贝一直在寻找其他的可能性。当1931年贝克尔获得波恩大学的教授任命之后,胡塞尔也曾向贝克尔推荐兰德格雷贝在波恩大学做任教资格考试。但兰德格雷贝最终还是没有在波恩大学获得这个可能。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我的老师胡塞尔付出许多辛劳,我想在德国的一所大学中谋求一个位置的努力也始终毫无结果”。他暗示这与胡塞尔是犹太人,而他自己的新婚妻子也是犹太人不无关系^[3]。反犹主义在那个年代已经在暗流涌动,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更是甚嚣尘上。

[1]参见L. Landgrebe, [untitled], in L. Pongratz (Hrsg.), *Philosophie in Selbstdarstellungen*, Bd. II,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77, S.134ff. 参见中译本:《德国著名哲学家自述》(中册),张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及以后各页。

[2]关于胡塞尔与贝克尔的思想关联,可以参见倪梁康:《现象学的数学哲学与现象学的模态逻辑——从胡塞尔与贝克尔的思想关联来看》,〔上海〕《学术月刊》2017年第1期。

[3]L. Landgrebe, [untitled], in L. Pongratz (Hrsg.) *Philosophie in Selbstdarstellungen*, Bd. II, S. 142.

最后兰德格雷贝还是在布拉格德语大学以《命名功能与语词含义——关于马尔梯语言哲学的一项研究》^[1]为题完成其任教资格考试的。他的指导老师是布伦塔诺的学生奥斯卡·克劳斯(Oskar Kraus, 1872–1942)。兰德格雷贝选择了这个论题而没有像原先计划的那样继续坚持狄尔泰的研究,一方面是由于对未来教职可能性的考虑,布拉格大学有布伦塔诺大弟子安通·马尔梯留下的布伦塔诺学派的语言哲学传统^[2];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觉得:“马尔梯的语言哲学研究非常细致和精确,但却不合理地被遗忘了”^[3]。

完成任教资格考试后,兰德格雷贝在布拉格大学开设的第一个讲座便是与狄尔泰的思想相关的“精神科学引论”。与此同时,他于1935年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开始在课余时间继续整理胡塞尔的手稿。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直至胡塞尔1938年去世之后,兰德格雷贝都在布拉格与弗莱堡之间来回往返,与时任胡塞尔私人助手的欧根·芬克一起,对胡塞尔的全部文稿做整理和编目,并对他自己在六年前编辑的所谓“发生逻辑学”文稿再做编辑加工。他自己在回忆录中写道:“胡塞尔本人已无法概览的那些约有四万页的速记体的讲座稿、著作稿和日常笔记。在弗莱堡滞留期间,我与芬克一起制定了这些手稿的整理和编目系统,它们的原则对于胡塞尔遗稿的整理直至今日仍然是权威性的”^[4]。

在此期间,兰德格雷贝同时进行的工作是对胡塞尔的一组专题研究文稿的编辑和出版。由于胡塞尔的著作在1933年纳粹攫取政权后便与所有犹太人著述一样被禁止在德国出版,因而兰德格雷贝最终是在胡塞尔1938年4月27日去世近一年后才于1939年由布拉格的学术出版社局(Academia Verlagbuchhandlung Prag)发表,题为:《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5]。

当兰德格雷贝拿到《经验与判断》的第一本样书时,德军的坦克已经开进了布拉格城区。布拉格于1939年3月15日陷落。而兰德格雷贝在这年初就已经因为纳粹的威胁而被迫停止讲课,整理胡塞尔手稿的工作也不得不中断。

此前在1938年8月,比利时青年范·布雷达来到弗莱堡,于不经意间开始了他拯救胡塞尔思想遗产的使命^[6]。他在回忆录中就当时的兰德格雷贝记载说:“9月5日,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到达弗莱堡。如前所述,他曾是胡塞尔的私人助手,而且完全熟悉由胡塞尔手稿的开发而会产生所有问题。……兰德格雷贝已下定决心继续进行他的工作,并且想要将一个系列的新的手稿带到布拉格去。当他在到达后得知,一所比利时的大学恰恰对这些文稿极为感兴趣,并且考虑承担对它们的完整开发时,他感到十分吃惊。让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兰德格雷贝随即就十分友善地接受了这件新鲜事。就像他懂得珍视布拉格‘哲学学会’所做的贡献一样,他也立即领会了,鲁汶的计划更为全面,而

[1] L. Landgrebe, *Nennfunktion und Wortbedeutung. Eine Studie über Martys Sprachphilosophie*, Halle: Akademischer Verlag, 1934. 关于安通·马尔梯(Anton Marty, 1847–1914)的思想以及与胡塞尔的关系可以参见倪梁康:《语言哲学的现象学视角——胡塞尔与马尔梯的思想史关联》,〔合肥〕《安徽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2] 马尔梯从1880年起至1914年去世都在布拉格大学担任讲席教授,并两度担任其校长的职务。

[3][4] L. Landgrebe, [untitled], in L. Pongratz (Hrsg.) *Philosophie in Selbstdarstellungen*, Bd. II, S.146.

[5] 关于胡塞尔《经验与判断》一书的产生过程以及兰德格雷贝的参与情况可以参见笔者的胡塞尔著作评论《〈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1939年)》(待刊)。

[6] 关于这段历史和这个使命的详细回忆与介绍可以参见海尔曼·范·布雷达:《胡塞尔遗稿的拯救与胡塞尔文库的创立》,倪梁康译,《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十七辑,《现象学与古希腊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75–221页。

且如果能够实施,也会更为令人满意。”^[1]

在兰德格雷贝和芬克的合作下,胡塞尔留在弗莱堡的四万多页手稿以及存放在布拉格的一千五百页文稿最终都被运到比利时鲁汶。兰德格雷贝也应范·布雷达的聘请,于1939年8月来到鲁汶大学,与此前半年已经到这里的芬克一起,在刚成立的胡塞尔文库开始工作,将胡塞尔的速记手写稿转录成打字机文稿,直至1940年5月10日。这天比利时受到德国军队的进攻。随着比利时的沦陷,兰德格雷贝和芬克的工作也告结束。他们作为外国人被送到法国南部,两个月后才重回鲁汶。此时胡塞尔文库为避免引起纳粹的注意而被解散,胡塞尔妻子和胡塞尔的文稿都被范·布雷达隐藏起来。兰德格雷贝与妻子一起到了其妻的故乡汉堡,在那里找了一份商业工作维生,直至战争结束。

1945年,兰德格雷贝在汉堡大学完成了任教资格复考(Umhabilitierung),并于两年后获得基尔大学的正教授职位。而后他于1954年应科隆大学的聘请而在那里担任讲席教授,并与弗尔克曼-施鲁克(Karl-Heinz Volkman-Schluck)一同领导自1951年在这里成立的科隆大学胡塞尔文库。它与芬克此前于1950年在弗莱堡大学建立的胡塞尔文库遥相呼应。它们都是战后重建的比利时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的分支机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科隆任教期间,兰德格雷贝至少培养了四位学生成为重要的现象学家,而且是专注于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研究的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保尔·江森、安东尼·阿吉尔、安特·帕采宁,他们的博士论文都发表在《现象学丛书》(Phaenomenologica)系列中:《活的当下》《历史与生活世界》《发生现象学与还原》《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科学与世界》^[2]。这与兰德格雷贝自己的毕生所学有关:历史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后面我们还会回到这两个论题上来。

在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的主持下,《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的各卷自1950年起开始出版,《现象学丛书》(Phaenomenologica)的各辑也自1959年起开始出版。在所有这些工作上,在现象学事业的创立和发展方面,兰德格雷贝所起的作用都是无法忽略的。范·布雷达曾说:“如果无法获得胡塞尔最后两个助手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和欧根·芬克的合作,或者至少得到他们两人之一的合作,那么这个研究场所的创建就是无法想象的。”^[3]

下、兰德格雷贝的狄尔泰历史哲学与精神科学研究

兰德格雷贝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历史哲学。这与他在其学业开始时就感兴趣的关于狄尔泰思想的博士论文主题有关。对于狄尔泰的思想,兰德格雷贝是在到了弗莱堡大学之后才开始注意到的。按照他的说法,当时《狄尔泰全集》刚刚出版前五卷,并且受到学生们如饥似渴的阅读和讨论^[4]。同时,胡塞尔的“批判的观念史”(即《第一哲学》的第一部分)的讲座以及他为该课程指定的必读教材,西美尔的

[1]范·布雷达:《胡塞尔遗稿的拯救与胡塞尔文库的创立》,同上书,第190-191页。

[2]Klaus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dmund Husserl*, Phaenomenologica 23,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66; Paul Janssen, *Geschichte und Lebenswelt. Ein Beitrag zur Diskussion von Husserls Spätwerk*, Phaenomenologica 35,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0; Antonio Aguirre, *Genetische Phänomenologie und Reduktion. Zur Letztbegründung der Wissenschaft aus der radikalen Skepsis im Denken E. Husserls*, Phaenomenologica 38,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2; Ante Pažanin, *Wissenschaft und Geschicht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Phaenomenologica 46,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2.

[3]H. Van Breda, “Laudatio für Ludwig Landgrebe und Eugen Fink”, in Walter Biemel (Hrsg.), *Phänomenologie Heute. Festschrift für Ludwig Landgrebe*, Phaenomenologica 51,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2, S.1-13.

[4]但从兰德格雷贝1928年发表的博士论文的引用情况可以看出,《狄尔泰全集》那时已经出至第七卷了。

《历史哲学问题种种》^[1],也重新唤起了兰德格雷贝青年时代就抱有的历史哲学兴趣。但当他想要以狄尔泰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课题时,他却并未受到胡塞尔的积极支持。按照他的说法,胡塞尔更想让他撰写关于迈农的对象理论的批评论文^[2]。不过胡塞尔最终还是同意了他的论题,并让他在贝克尔的帮助和指导下进行写作。但看起来给兰德格雷贝帮助最大的还是另一位正在撰写论题相近的任教资格论文《瓦尔腾堡的约克伯爵的哲学》的他的师兄弗里茨·考夫曼:“我也要感谢考夫曼给了我诸多启发!而且他以其伟大而敏感的哲学严肃性以及他的尊严和卓越而始终是一个楷模,正是带着这些品质他后来才承受住了他的流亡的沉重命运。直至他1959年去世,我一直与他保持着友好的联系。”^[3]

可以说,兰德格雷贝从他的哲学研究的一开始就试图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之间寻找内在的联系。按照珀格勒的说法,这是兰德格雷贝借助黑格尔的眼光而发现的:“兰德格雷贝早已通过对青年马克思巴黎手稿的阅读而发现了黑格尔。对他来说,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改变仍然可以与胡塞尔的道路最终结合为一。”^[4]

这也体现在兰德格雷贝对狄尔泰的研究中:“在博士论文中,我试图在胡塞尔现象学分析和海德格尔此在分析的昭示下诠释狄尔泰的构想:将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构建为精神科学的哲学基础。”^[5]他在这里所看到的是当时在历史哲学思考中存在着的奇特三角关系:

首先是狄尔泰早年受历史学派影响,在其历史哲学研究中提出与自然科学划界的“精神科学”概念。晚年他在遭遇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之后开始受后者的现象学方法影响,着手修改他早年的著作并撰写晚年《精神科学的奠基研究》的论文以及《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的论著^[6]。起初兰德格雷贝在胡塞尔那里找不到任何有助于他的历史哲学研究的理论^[7],但他后来通过对狄尔泰的研究得知,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恰恰可以为精神科学进行现象学的奠基,无论这里所说的“现象学”是特定意义上的“思维心理学”,还是指狄尔泰和胡塞尔所理解的“描述心理学”。兰德格雷贝将这两种意义上的“现象学”理解为一种在基本概念方面的现象学澄清:“精神科学的‘构建’应当在其构建材料方面得到批判的检验。它的那些在其逻辑的相互依赖性中展示出来的基本概念,必须恰恰在这个顺序中得到现象学的澄清;随之,接下来的展示部分也就会在一种诠释报告与现象学分析的持续的相互交错中活动。狄尔泰本人便完全是在这样一种原则诠释的意义上思考精神科学的奠基的。”^[8]他引述狄尔泰本人的话:“精神科学的奠基首先并主要是对这样一些概念的诠释,它们对于由精神科学发现的精神世界的联系是构造性的。”^[9]兰德格雷贝在这里提到的“诠释的报告”和“现象学的分析”,是在狄尔泰那

[1]Georg Simmel, *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Eine erkenntnistheoretische Studie*,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92.

[2][5][7]L. Landgrebe, [untitled], in L. Pongratz (Hrsg.) *Philosophie in Selbstdarstellungen*, Bd. II, S. 138, S.138, S.138.

[3]L. Landgrebe, [untitled], in L. Pongratz (Hrsg.) *Philosophie in Selbstdarstellungen*, Bd. II, S. 139.——笔者在题为《历史哲学的现象学—解释学向度》(待刊)的文章中已经论述了考夫曼的历史哲学思想、他的任教资格论文《瓦尔腾堡的约克伯爵的哲学》(“*Philosophie des Grafen Paul Yorck von Wartenburg*”)以及他与老师胡塞尔的思想关系。

[4]Otto Pöggeler, “‘Eine Epoche gewaltigen Werdens’ Die Freiburger Phänomenologie in ihrer Zeit”,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Vol. 30, *Die Freiburger Phänomenologie*, 1996, S.23.

[6]Wilhelm Dilthey, *Studien zur Grundlegung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1907–1910; 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Berlin Reimer, 1910.

[8]Ludwig Landgrebe, *Wilhelm Diltheys Theorie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S. 239f.

[9]W. Dilthey, *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GW VII,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2, s.309.

里开启的历史哲学思考的两个方法论路径^[1]。

其次是海德格尔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和发展了这两个在狄尔泰和胡塞尔那里都或强或弱地显示出来的为精神科学奠基的方法论意向和诉求,并很早(1919年)就以“现象学的解释学”^[2]的概念来标示它们。而兰德格雷贝虽然在1923年就听过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讲座,对其“现象学就是此在实际性的解释学”的说法连同其“重锤敲打式的表述和表现主义的措辞”^[3]记忆犹新,但他在博士论文中还是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研究视作对“这样一个信念的最终证实”,即“他[狄尔泰]恰恰在这些问题的中获得了一个关键的位置,它提出这样的可能和要求:在对这些问题的现象学澄清过程中以他的观点为出发点,并且评估它与所有过去的和同时的尝试相比原则上的新颖所在。”^[4]

兰德格雷贝在这里已经在努力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对历史哲学问题的现象学澄清方面结合为一,当然这也是海德格尔本人在那个时期(可能直至1937/38年^[5])都曾持有的想法。兰德格雷贝自己在回顾这个后来他毕生坚持的努力的起步阶段时说:“我很长时间都没能成功摆正胡塞尔现象学与海德格尔思想彼此间的关系。我在两者间摇摆不定,找不到一个可靠的基地。直到后来我才看清,为此必须首先探究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他在其中最终都还自称是‘初学者’),直至它的最终结论,而后达到一个点,在这里它超出自身而指向一个界限,在这里开始有‘形而上学’的问题。胡塞尔自己将‘实际的问题’亦即‘实际性问题’归派给‘形而上学’,同时并未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阐释。只是在这里才有可能对海德格尔从《存在与时间》的超越论现象学起点向‘回转(Kehre)’的转向作出公正的评判。在海德格尔的后期著作中,实际性的问题是以‘本然(Ereignis)’的名义出场的。”^[6]

这个“可以说是在胡塞尔—狄尔泰—海德格尔的三角形中进行的”^[7]精神科学奠基的努力,或者说,对历史哲学基本概念的现象学—解释学澄清的努力,一直延续到兰德格雷贝在博士考试结束后对其任教资格论文的准备工作中。他在回忆录中对他后来的狄尔泰研究做了如下的概括:“我的目标在于,将狄尔泰的历史世界的分析纳入到超越论现象学的语境之中,并且同时弄清它们与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关系。出发点是狄尔泰的体验和体验联系的概念以及从中得出的命题‘从总体出发的理解’。这里的主线是海德格尔的‘能是总体(Ganz-sein-können)’的概念与生存可能性的概念,以及生存可能性的概念与在传统中展开的各个可能性概念的关系问题。狄尔泰将体验联系的总体理解作为一种朝向个体形态的生成(Werden)。因而,各个个体‘自身(Selbst)’的发生以及它贯穿在睡眠的间歇中的意识统一的发生(Genesis)便成为核心问题,在此发生中,所有经验的获得都是在没有‘清醒自我’参与的情况下被托付给了一种‘被动发生’,并且被改变。这种生成的标记就是梦和那种众所周知的

[1]关于在狄尔泰那里包含的这两个相互竞争的思考方向在伯纳德·格勒图伊森那里也被称作“思维心理学的”和“解释学的”(Bernhard Groethuysen, “Vorbericht der Herausgeber”, in W. Dilthey, *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GW VII,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2, S.VIII),在E. W. 奥尔特那里则被称作“描述—心理学的认识论动机”与“解释学的运作方式”(Ernst Wolfgang Orth, “Bericht: Wilhelm Dilthey und die Phänomenologie. Wissenschaftliche Tagung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vom 6. bis 9. April 1983 in Trier”,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Vol. 15, *Studien zum Problem der Technik* 1983, S.160)。对此较为详细的讨论可以参见笔者的论文《历史哲学的现象学—解释学向度——兼论胡塞尔与考夫曼、兰德格雷贝、伽达默尔的思想关联》(待刊)中的第十一节:“‘解释学的原则’作为出自狄尔泰思想遗产的另一发展结果”。

[2]Martin Heidegger, *Zur Bestimmung der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7, s.131.

[3][6][7]L. Landgrebe, [untitled], in *Philosophie in Selbstdarstellungen*, Bd. II, S. 135, S.134, S.140,.

[4]Ludwig Landgrebe, *Wilhelm Diltheys Theorie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Bd. II, S. 238.

[5]参见笔者的论文《历史哲学的现象学—解释学向度——兼论胡塞尔与考夫曼、兰德格雷贝、伽达默尔的思想关联》(待刊)中的第十节:“‘历史的思义’作为海德格尔历史存在论的基本方法”。

期待,即在醒来后‘事物会显现为新的样子’。这种现象表明:一个个体自身的发生永远不可能仅仅从周围世界和社会的条件中推导出来。随着这个‘被动发生’的问题,胡塞尔的构造学说的基本问题已经被触及到了,它应当就是我以后一再探讨的问题。当时我并未意识到,我的不断膨胀的[任教资格]论文构想已经抛出了一大批的问题,它们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得到解答,而是恰恰需要一生的劳作。”^[1]从兰德格雷贝的这个弥足珍贵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最初的任教资格论文计划已经逐渐从狄尔泰的历史哲学思考过渡到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研究^[2]。

不过如前所述,由于在德国大学申请任教资格的尝试无果而终,兰德格雷贝最后还是在布拉格大学完成了关于马尔梯的语言哲学的任教资格论文。但在考试之后他便立即重回他的狄尔泰精神科学的研究,并于布拉格大学开设了他的第一个讲座:“精神科学引论”。这个讲座看起来与考夫曼在任教资格论文之后出版的《当代历史哲学》(1931)的著作一样,是对狄尔泰身处的思想背景的更为广角的审视,或者说,对在狄尔泰这里汇合的两条思想线索的梳理:一条是从赫尔德到兰克的历史学学派的关于方法论原则的思考,一条是从康德到观念论的哲学发展路线。兰德格雷贝试图说明狄尔泰将这两条路线结合起来的意图。

因此,从兰德格雷贝的回忆来看,他的狄尔泰精神科学基础研究在任教资格论文设想中是向下追索到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这里,而在完成任教资格考试后的讲座中则主要是向上回溯到从赫尔德开始的历史哲学思想那里。然而遗憾的是,兰德格雷贝的上述关于狄尔泰的任教资格论文设想以及任教资格考试后的讲座内容至今都还没有公开出版。

[责任编辑:曾逸文]

A Genetic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Landgrebe's Intellectual Connection with Husserl and Dilthey

Ni Liangkang

Abstract: As a disciple of Husserl and the main compiler of his manuscripts, Landgreb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ighlighting the genetic phenomenology and the historical phenomenology as the core theories of Husserl in his late years. Meanwhile, by incorporating Dilthey's analysis on the historical world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d Heidegger's fundamental ontology, Landgrebe not only elucidated the potential foundational significance of phenomenology to the mental science, but also made an important exploration into linking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to fundamental ontology.

Keywords: Landgrebe; Husserl; Dilthey; genetic phenomenology;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1] L. Landgrebe, [untitled], in *Philosophie in Selbstdarstellungen*, Bd. II, S.140.

[2] 兰德格雷贝在这里所涉及的问题,笔者会在本文的续篇《胡塞尔的“发生”概念与“发生现象学”构想》中做展开讨论。